

中俄文学互译出版项目·俄罗斯文库

盖尔曼·萨都拉耶夫
作品集

ГЕРМАН
УМАРАЛИЕВИЧ
САДУЛАЕВ

一只 燕子 不成春

[俄罗斯] 盖尔曼·萨都拉耶夫 著
富澜 冯玉芝 译



ОДНА ЛАСТОЧКА ЕЩЕ НЕ ДЕЛАЕТ ВЕСНУ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一只燕子不成春

盖尔曼·萨都拉耶夫作品集



[俄罗斯] 盖尔曼·萨都拉耶夫 / 著

富澜 冯玉芝 / 译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只燕子不成春: 盖尔曼·萨都拉耶夫作品集 / (俄罗斯) 萨都拉耶夫著; 富澜, 冯玉芝译.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5.7
ISBN 978-7-5153-3499-8

I. ①—… II. ①萨… ②富… ③冯… III. ①中篇小说—俄罗斯—现代
②长篇小说—俄罗斯—现代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62713 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01-2015-1695

Одна ласточка ещё не делает весны

Шалинский рейд

Copyright ©Герман Садулаев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China Youth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中俄文学互译出版项目·俄罗斯文库》由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俄罗斯出版与大众传媒署批准, 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和俄罗斯翻译学院负责组织实施。

责任编辑: 王钦仁

书籍设计: 瞿中华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址: 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 57350507

门市部电话: (010) 57350370

印刷: 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870×1240 1/32

印张: 11.75 插页: 2

字数: 293 千字

印数: 1-5000 册

版次: 2015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印次: 2015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 49.00 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 57350337

目录

序 萨都拉耶夫和他的创作	冯玉芝	001
一只燕子不成春	富 澜 / 译	015
突袭沙利	冯玉芝 / 译	103

序

萨都拉耶夫和他的创作

在俄罗斯当代文学中，有一颗耀眼的新星。他年轻，然而思想深邃；他没有笔名，但总是用第一人称来进行历史写作；他写作史不长，却早已经遍获俄国文学大奖。他就是备受瞩目的作家、政论家、律师盖尔曼·乌马拉里耶维奇·萨都拉耶夫（Герман Умаралиевич Садулаев）。

盖尔曼·乌马拉里耶维奇·萨都拉耶夫于1973年2月18日生于车臣—印古什共和国的沙利村。沙利位于车臣平原南部，孙扎河的支流贾尔卡河畔，距阿尔贡火车站18公里，其西北36公里为车臣首府格罗兹尼。沙利为公路交通枢纽。沙利兴起于14世纪末，至19世纪已成为大车臣最重要和最大的中心村落之一，人口达9000人。鉴于其中心地位，沙利成为军队集结地。1990年

沙利建市，成为车臣共和国沙利区的行政中心，1996年人口为24000人。盖尔曼·萨都拉耶夫的很多作品以沙利为背景而展开。

盖尔曼的父亲乌马拉里·阿里耶维奇是车臣人，母亲维拉·巴甫洛夫娜是捷列克河边的哥萨克。他在格罗兹尼读完了中学。1989年离开家乡，到当时的列宁格勒上大学，本来想读新闻系，以便回家乡的报社当记者，据说是在最后一刻改变了主意，考入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攻读法学，此后一直生活和工作在这个城市。他的第一部作品中篇小说《一只燕子不成春》在2004—2005年间的几个月里写成。最初，作者自己将其上传到网上，也向出版机构寄送过稿件，只有伊利亚·科尔米里采夫（超文化出版社社长）允诺，只要作者再写几部小说，就出版他的书。2006年，这家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我是一个车臣人！》一书，其中包括9部短篇和中篇，都是以作者的个人生活为基本素材的车臣战争故事，在读者和评论家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作者称它是“一部务实的作品”。2008年，他的长篇小说《记事板》入围俄国布克奖。2009年6月，盖尔曼·萨都拉耶夫发表长篇小说《AD》，轰动一时，登上最畅销小说排行榜，成为“月度小说”。2010年，长篇小说《突袭沙利》入围俄国布克奖并获得《旗》杂志颁布的文学奖；同年，获得俄国“大书”（“Большая книга”）奖。至今，作者已经出版7部长篇小说，其他作品，如《去他妈的广播》（2006）、《伊里》（2006）、《暴风雪，或世界尽头》（2008）、《游击队员与伪警察》（2009）、《上帝之鞭》（2010）、《向右转，齐步走！》（2011）、《狼跃》（2012），以及小说集《黑暗之镜》，

与萨夫洛诺夫、诺维科夫、切普林等其他 16 位作家合写的长篇小说《十六幅画》等。盖尔曼·萨都拉耶夫还是一位活跃的社会活动家，他的每一次电视访谈都会引起巨大的社会轰动和各类议题的激烈讨论。批评家们盛赞他的才华，称其为“俄国最后一位现实主义作家”、“不听命”的写作者，将其写作的真实性媲美于沙拉莫夫的科雷马的集中营主题创作，即毫无虚构的作品。

从第一部作品《一只燕子不成春》起，盖尔曼·萨都拉耶夫开始了车臣人诗意的独白。背井离乡的车臣人和与故乡难以割舍的血肉深情，在导弹的轰鸣声中，在生死边缘的挣扎中，被细致地摹写出来。生活经验、对事实的陈述、战争回忆，代替了小说的闲笔。1991 年以来的两次车臣战争成为创作的浓厚的底色。作者写道：“……说不定我也能成功地创作出真正的有情节的长篇小说、中篇小说。……这以后再说。而眼前，眼前是一股一股地冒着血。这不是那种匀速平稳地流动着的深紫色的静脉血，这是鲜红的动脉血，从被箭射穿的喉咙里汩汩地涌出，喷散成血滴，那是很难擦掉的，你们知道吗？”作家把战争中的个人生活片断与官方信息和媒体新闻截然分开，严厉抨击为了“民主价值观”而置人民（包括车臣人民）的生死于不顾的战争策动者。在第二部中篇《天为何不塌》中，盖尔曼·萨都拉耶夫以梦境叙事讲述了一个死亡之城的永远的战争印记，对普通人的悲剧性死亡予以极大的关注。中篇小说《坦克何时醒来》以回忆的方式，叙述俄罗斯人和车臣人童年的友谊和战争的羁绊。对于俄罗斯人和车臣人情感的细致摹写的类似的作品还有短篇《胜利日》等。这

种个性化的战争文学写作在当代俄罗斯文学中犹如一股清新之风，在官方观点和商业化写作景观中独树一帜。而就体裁而论，纪事小说（хроника）是俄国文学文本中最古老的而且独特的写作形式，它包括社会、政治、族群、家族史事的多样叙述作品。个人所经历的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都会成为小说的叙事线索和原则。它与历史小说的区别就在于叙事的个人化。

盖尔曼·萨都拉耶夫严肃思考 20 世纪战争与军事冲突中的人道主义课题。可以说，那些被迫在阿富汗、第聂伯河沿岸、阿布哈兹、车臣等地区浴血战斗的普通人的所思所想正是当代文学的缺项。盖尔曼·萨都拉耶夫作为车臣人，看待俄罗斯与车臣之间的战争眼光与其他人迥异。他是“从内部”，从车臣人的角度评判发生在故土上的军事行动，即车臣老百姓的视角。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战争参与者，都无法幸免于战争的血腥和残酷。这个视角与俄国文学中伟大的卫国战争题材有所不同：历史的全景从未获得作家的青睐。战争的牺牲品——土生土长的战争亲历者的生活被破坏，他们在战争中的血泪情仇超越了哲学的追问，他们破碎的生活，离散的家园使得“战线在哪儿”“谁是敌人”“和谁作战”“为什么打仗”变得毫无意义。俄国士兵所思所虑亦是同理。批评家 В. 布斯托瓦雅在评论文章中写道：“对于新战争中的人物来说，他们的事业不再是必须流血捍卫自己的家乡（因为他们远离家乡，在陌生的空间作战）。军队也不再是一个令人骄傲的团体（组织头脑不清醒，任何的成功都伴随着非理性的牺牲，上层的计划不再令人信服）。不允许追求荣誉和功勋……这样一来，

新的战争给它的参加者能带来什么呢？只剩一种不太名誉的方式：工作，‘就这么一种职业而已’，不再保卫家乡，就是间或完成一些战斗任务，不盼望结局，不追求结果，不总结形势变化。也是，每天都从冲突中获取大量报酬，又如何希望职业性的战争结束呢？”在创作中，盖尔曼·萨都拉耶夫把现代战争中的上层人物的“利益观”层层拨开，许多当代事件都毫无掩饰，形成了独一无二的“萨都拉耶夫式”的评判立场，即“看待历史没有任何别的观点，除了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的观点。于是我明白了，是这样的。如果他，那个时代的普通人，丧失了家庭和房屋，如果他被拷打并被打死，那么这就已经是全部的历史。而能否克服封建割据，是否进行了进步的改革——这对上帝来说不重要。谁想出了‘历史的必然性’，谁就早已远离了上帝”。这一立场彻底揭露了两次车臣战争中虚假的英雄主义神话及其发生并膨胀的社会历史病因。

许多鲜明的思想观点见诸盖尔曼·萨都拉耶夫的创作。许多作品，包括政论都卓越地传达了多样性的文化——车臣文化特点、俄罗斯文化要义等。很多批评家都注意到，除了情感性叙事、抒情性独白之外，作者的视域极其宽广。《狼跃》的副标题——“从哈扎尔汗至今的车臣政治史特写”。作者揭示了俄罗斯“类”车臣的十几个“另册”民族的历史地位形成的过程和逻辑。由于这类题材的“论战”性质，1991年以来的俄罗斯历史文化课题被重新讨论和梳理，对历史文化的回溯，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文化批判和反省的“寻根”之举。《上帝之鞭》和《伊里》都是表达寻求人性和灵魂力量的作品。而历史的波涛和文化境遇促使作家在阐

释战争、宗教、极端主义、个人生活的时候，能够始终秉持“复调”的包容性写作，从语言手段的复杂运用层面入手，将当代人并不熟知的近现代历史细节完整地、艺术地凸现出来。由于第一人称和作者的“裸露式”（我，名叫盖尔曼·乌马拉里耶维奇……）出场，他对俄罗斯和欧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问题的扫描更具有场景性、深邃性和引人入胜的阅读性。这是对文学上的“泡沫文化”的清除，捍卫了文学对真理的追求。

《突袭沙利》发表于2010年的《旗》杂志第一期。这是盖尔曼·萨都拉耶夫致力于写作“车臣人的吠陀经，车臣人的摩西五经”的又一力作。他认为，长篇小说《突袭沙利》的写作十分困难，但也非常珍贵，写作持续了3年，自己走访了大量两次车臣战争的亲历者，采访了那个时期的有影响的人士，查阅了新闻、纪录片、文献等，不一而足。所有的一切事件都才过去不久，资料的来源却又互相矛盾。一切都混淆在一起，真相的寻求只能是主人公“我”作为亲历者在历史中游走。可以说，小说的体裁因此变得独特——具有半写实的纪录片性质。小说通过主人公塔尔梅兰·马卡玛多夫和他的亲友的命运，对第二次车臣战争中的一次军事行动进行了细致然而令人心情沉重的个人化解读。政论评判和艺术描写紧紧地结合在一起。“我”对医生、侦查员、律师讲述的自己和族人战前战后的生活，自己亲历的“新战争”中的政治事件，独立的车臣伊奇凯利亚共和国和统一的俄罗斯之间的政治、军事和宗教纠葛，汇成一部当代局部战争阴云笼罩下的普通人的血泪史。暴力带来的恐惧和无序，都在身心受创的“主人公”

口语化的叙述中，化为一代人伤痛的记忆史。

幻觉、梦呓、意识流变是《突袭沙利》中时常出现的片断。这个感觉世界正是对无理性荒谬世界的对抗。小说的开篇和结尾都是对梦境的建构。这是一个触目皆惊的独特小说构图。因为当“我”叙述时，战争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与我和我的生活不仅相对而且如影随形的一个“实体形象”。塔尔梅兰·马卡玛多夫在列宁格勒学习法律，因第一次车臣战争爆发，无法在俄罗斯找到工作，第二次车臣战争爆发前，回到车臣，经亲友介绍到安全局工作并被迫受洗；结婚的对象是一位带着孩子的“战争寡妇”列伊拉，她因为改嫁，受到族人和村里人的侮辱。后来，列伊拉被坏人掠走，关在地下室，15天之后被找到，已经奄奄一息；在此之前，塔尔梅兰和叔叔，即他的上级，还愤怒地讨论在格罗兹尼出现的公开行刑的野蛮和不文明。这件事情一发生，他们动员整个安全局的力量，找出了劫持列伊拉的人，公开进行了行刑——由列伊拉开枪！但是，当晚，列伊拉就在自家厨房饮弹自尽。塔尔梅兰的父母为躲避战乱，流离失所。塔尔梅兰从此以后就像是行尸走肉，在剧烈变动的形势下，把世代的美德——笃信、劳作、友爱，抛在一边，随波逐流，带着武器，在与莫斯科媾和和永远进行圣战的派别之间，在巴萨耶夫、杜达耶夫和马斯哈多夫之流的反复登场中，不经审判就杀死嫌犯，为争夺油井和其他部门的人大打出手，收取保护费，在国家强力部门的无休止改组中升职和被废黜，在第二次车臣战争爆发后，带领一支后备队，潜藏在沙利附近；为吸引俄军主力，掩护马斯哈多夫的主力部队

从格罗兹尼出逃进山，公开“突袭”进入沙利，并听命组织群众集会，结果集会地点被俄国野战集群发射的战术导弹击中，四百多名无辜群众被炸死。塔尔梅兰·马卡玛多夫带领剩余“逃亡战士”进山。受到围剿后，他使用战友的护照，仓皇出逃至俄罗斯的大城市，伪装为商人，为“游击队”和“抵抗运动”募集资金和筹款；在莫斯科轴承厂文化宫发生劫持人质案后，心灰意冷。在一次到车臣城市古杰尔梅斯“汇报工作”的间隙，偶然获知了马斯哈多夫的藏身之地。“我们听到太多的要战斗到最后一个车臣人的战争。我们经常被号召要战斗到最后一个车臣人。我明白这一天终于到了：阿斯拉·马斯哈多夫就是那个最后的车臣人……为了停止战争，我应该出卖马斯哈多夫。为了结束毫无意义的流血屠杀。为了无辜的年轻人不再去‘为祖国而死’，去完成恐怖行动，杀死和他们一样无辜的‘为祖国而战’小伙子们。……我的背叛——这是我的心灵的丰功伟绩。是退位诏书！”塔尔梅兰将这一情报秘密经过中间人出卖给俄罗斯情报部门，直接导致马斯哈多夫被围困并被击毙于地下室。他本人则畅想飞往巴黎……

一个法学院的毕业生沦为“武装分子”的过程具有悲剧的意味。然而，在盖尔曼·萨都拉耶夫的笔下，历史的悲剧是不断地叠加重演的过程。车臣政治的紊乱，经济的萧条，宗教派别的争权夺利，所谓自己人的不同阵营的厮杀，在历史上早已经是司空见惯的案例。作者不仅回顾了车臣人在近现代的被迁徙的动荡生活，还重彩描写了宗教史上著名的昆塔—哈吉·基什耶夫的故事：“他的传道对现代人来说是不同寻常和令人惊奇的。在那个

时代，所有的伊玛目和教长都号召人民拿起武器，参加圣战直至全胜，而昆塔却使人们相信应该停止无意义的与沙皇军队的对抗。他说，卷入结果可想而知的战争等于自杀，而自杀对至高无上的神无益。他请求放下武器：手持武器的人是有罪的，因为他不寄希望于神的仁慈，不把自己托付给神之手。”作家将这个重写的形象与托尔斯泰笔下的卡拉塔耶夫相媲美：“他告诫要使用非暴力和向善。告诫要珍视每一个生物，甚至植物。沙皇当局十分不解。一方面，他的布道是和平的和不危险的；另一方面，布道者周围聚集的听他讲道的上千人又让俄国当局害怕。昆塔一哈吉被捕了，并被永久流放到诺夫哥罗德省的偏僻的小镇子。昆塔懂阿拉伯语和土耳其语，精通先知的学说，但一个俄语词也不会。他无法在俄国的城市安顿好生活，经常不能说明白，他需要什么。……很快，昆塔就因贫病交加，饥饿潦倒，死在了寒冷的俄罗斯。他才34岁。”

正直，毫无暴力倾向，热爱和平，这是真正的车臣人，“他是第一个真正的车臣民族主义者。他不想让车臣人民为一种思想体系牺牲，为任何的思想体系，包括伊斯兰教在全世界胜利的思想而牺牲。但是，为了民族肉体 and 文化的存留他准备战斗到最后”。《突袭沙利》中的民族文化特性十分浓重，而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作家对这种特质的历史形成、演化予以了形象性的比对性的揭示，比如，小说以诙谐的笔触讲述了“我的曾祖父别济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的完整的故事——战争混子（肩章和勋章都是捡来的）、江湖术士（给马治病和给人治病，在别济这里没什么大的区别。都是他的患者）、装神弄鬼的牛皮大王（他制造神圣的避

邪物、专治妇女不孕不育)以及最后“不兜圈子地直奔天堂”(严格的守斋之后,在开斋日吃多了,吃了整整一个小羊羔,就死于肠梗阻)……这种形象的“复写”也是小说体现历史文化的重要结构内容。

盖尔曼·萨都拉耶夫直视历史的勇气十分惊人。他的创作一度被认为是对现实中尖锐的热点问题的“文学论战”。诚然,作家没有参加过任何一次战争,不是车臣任何社会集团的一分子,没有像20世纪80年代的“阿富汗一代”军旅作家那样写出“亲历的”历史。但是,作家却以最具主观的笔触选取了“普通人”客观的立场。关于现代战争,他写道:“在村子周围挖战壕,布上机枪排,烧制反坦克绕刺铁丝鹿砦,自卫性防御——没有任何意义。阵地战的时代过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最后一次战线变化有决定意义的战争,曲线向前推进,蚕食后方基地,深入敌后,以此确定了胜利者和赢家。地球上火苗越来越高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另一种样子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关键目标势均力敌的高精确打击,代替连续不断推进的战线的,是在世界任何一处都能做战术展开的移动部队。……这是自杀,而不是战斗。第一次车臣战争的任何一场交战都变成了车臣部队毫无意义的自杀行为。它诱使俄罗斯常规部队用上全部武器:火炮、榴弹、火箭和炸弹。在如此这般的痛击之后,任何一个坚固的阵地都变成了战壕中的阵亡将士公墓。如果防御的界限是居民点,那么连同它一起被消灭的还有平民。”关于伊奇凯利亚的独立犹如闹剧:“当和平完全到来的时候,我们就不再自豪,我们感到羞愧。为我们参加了

战争而感到羞愧。或者甚至很简单——就在家门口的不远处参战。……我们的情报和强力系统被经常的改革、重编、联合、重组、更名和其他的官僚主义和传染病弄得动荡不安，日常工作变得更复杂了。我们还未来得及习惯自己的称谓、袖标和证件，就又赶上新的改革了。”“但我还是得不到合理的解释。甚至翻阅自己严格地按时间先后顺序所写的笔记时，在浏览发黄的报纸剪报时，我看不到合理性和合法性。这不是火车头和车厢的一节牵引另一节的编组的历史。这更像是其他别的东西。……就是在地上滚雪球，把雪压实的同时，也把粘在上面的枯枝败叶和去年的草屑、小石子和垃圾都推卷进雪球了。就是这样——不是连接，而是众多事件的黏附。黏附，黏附，再黏附。达到一个临界质量。然后——就是断头崖，崩塌，就像高山上发生的冰川消融或者泥石流爆发。”在对历史细节的把握方面，盖尔曼·萨都拉耶夫远离了“失真的新闻”。无论是借人物之口，还是插入联想格式的评论，小说都严厉地抨击“战争新闻”“电视上的战争秀”之致力于“营销战争”，制造政治和宗教阵营的对立以及对特定群体或者族群缺乏文化尊重和理解的“污名化”推波助澜、煽风点火的当代恶行。这是对普通人发动的蒙蔽战争，即双重战争。

任何真正的文学作品，都应该是抒发感情但归结于理性的诗学文本。自传式的可信的主人公作为叙事中心，链接了具有悲伤基调的历史回望和对战争的批判式思考。塔尔梅兰·马卡玛多夫在去机场路上的出租车上，听司机“侃大山”，先是眉飞色舞说飞机的故事，然后低声说自己如何在战争期间参加“收尸队”，

埋葬无主尸首（包括俄军士兵）的情况，等到乘客问起傻子楼（弱智人士收容所）在战争中的遭遇时，司机的“眼睛暗淡下来……沉默了好几公里”……这，已经不是一般的编年史记录，而是触及了战争的病理学。但是，这个文本的对话的对象——读者，更能体会到“真相叙事”审美背后的基本人性的当代失落。“第一人称”和主观视点的运用，是盖尔曼·萨都拉耶夫相信读者的判断力的尝试。所有的战争都是对人性的暴力，被抛到生死边缘的普通人的命运是作者创作激情的出发点。甚至，在《突袭沙利》中，只有不同阵营的迷惘者和受害者，没有一以贯之的敌人、对手、胜利者，例如被绑架的俄军少将、中了埋伏的雷日科夫中校、战争后乘民航飞机被击落的特罗舍夫将军（他在回忆录中称，是自己下令向平民发射导弹），等等。战场冲突完全让位于战后反思，这也是作家创作的基本风格特点。

盖尔曼·萨都拉耶夫的作者形象问题是其创作学上最值得关注的突出现象。他被誉为“新现实主义”作家不是偶然的。2000年以来，俄罗斯战争文学出现了新的社会伦理思考的倾向，新的（局部）战争文本对多元文化的关注，引起了传统文学主题和战争描写的反思性的蜕变。批评界越来越重视以盖尔曼·萨都拉耶夫为代表的新一代作家群体[米·阿列克谢耶夫《我的斯大林格勒》（2003）、符·博格莫洛夫《我的生活，或者是你梦到了我》（2009）、谢·阿努福利耶夫和巴·佩佩尔施泰因《种姓神遗之爱》（2002）、亚·屠格涅夫《睡觉并且相信。封锁故事》（2007）、博亚尔绍夫《坦克手，或者“白虎”》（2008）]的小说创作的历史文化

语境、文化价值失落引起的“创伤叙事”的经验以及对神话信仰的溯源意识。系列作品主题惊人的一致、作者形象和主人公形象及其叙述声音一致合流，这些都充分说明，作家在纪实性的“我传”中所要传达的思想感情、理智意识并非某个人物所独有，而是作者对以普通人为代表的人类精神世界和人类新的尊崇，是对人类所期冀的共同文化空间的道德观和世界观的形象化演绎。

冯玉芝

2015年1月于南京